

艺文 从谈

双周 学术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

关于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认识

刘跃进

中华文学史料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2021年年会暨第五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终于召开了。这里,我想谈一谈中华文学史料研究之难,尤其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之难。

第一,民族文学史料取舍难。当下的文学研究,实际上根植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学史的话语框架,现在看来,从理论到实践,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索。什么是文学?如何评价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料?如何界定和取舍文学史料?中国文学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外,还有其他的传统吗?这些基本理论问题,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中国文学从来就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越复杂,文学就越丰富。这就要求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才能真正理解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实用性传统就值得重视。文学的这种实用性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譬如《昭明文选》将文学作品分为38类,《文苑英华》分为42类,所收作品,皆为范本。可是按照今天的文学标准,只有部分韵文和数量不多的所谓美文,才算作文学,其他多数应用文体,在中国古代是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今却被逐出了文学伊甸园。这样的文学研究,显然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实际风貌。就十六国北魏到隋代的文学研究而言,绝大多数作品是这类应用文字。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类作品很难算是文学,但在当时,这些文字确实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文学研究,理应关注这些作品,系统整理这些作品,深入研究这些作品。但现实情况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舶来的文学观念,面对着丰富的文学史料,我们往往无所适从,只能削足适履。因此,我认为材料的取舍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民族文学史料评价难。长期以来,我们评价文学作品有两大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暂且不论,就艺术标准而言,也比较狭隘,无外乎是《文学概论》等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一些关于美文的陈规旧矩,譬如人物形象、作品结构、文学语言之类,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可谈了。用这样一些标准来衡量古代文学,往往捉襟见肘。譬如研究十六国北魏至隋代文学,南朝美文就是标准。文学史家在评价北方文学时,从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到后来的所谓文学的演变,包括文体、文风的演变等,用的都是南朝化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北方文学后来逐渐接近,甚至超越了南朝文学,于是就视为“进步”。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换一种评价的眼光看,这也许是北方文学的不幸,因为这种南朝化的演变,恰恰是北方文学失去自我的开始。

用这种比较僵化的标准分析现代文学,同样面临窘境。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参与策划了以晋察冀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史料的收集工作,协助完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包括《晋察冀代表作作家代表作品选》《晋察冀日报>文艺文献全编》《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文艺文献全编》《晋察冀画报>文艺文献全编》等)的编纂。这些文学史料,包括秧歌剧、快板、民间讲唱、乡间俗曲等口头文学,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有很多讲述者就是作者,他

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作品也未经细致打磨,自然不会进入现代文学史家的视野。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民间文学艺术真正发挥了唤醒民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这就给我们一种启示,文学创作必须与时俱进,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史上的丰富实践告诉我们,研究文学,除了关注其文学史的意义外,还必须回到历史现场,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文学,而不是以一种超越历史的亘古不变的标准去衡量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分析研究民族文学创作,同样需要有一种开阔的视野,一种历史的眼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口述文学,很多还在人民群众中的传唱。其中既有长篇巨制,如史诗;又有形式各异的短小体式,如歌谣。这些文学史料如何评价?就需要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中,归纳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和评价标准。

我们知道,文学评价标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谁也无权强求别人遵循自己的标准。但是客观地说,今天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大多还遵循着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观念,核心就是所谓美文。好像这种美文与时代无关,与社会无关,与人民无关,结果路越走越窄,文学成为小众化的精致摆设,自然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如何确定我们的文学评价标准,拓展文学研究空间,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第二个难点。

第三,民族文学经典认定难。什么叫文学经典?经典就是常读常新的作品。中华文学主流经典如《诗》《书》《礼》《乐》《春秋》等“五经”,其文本已经固化,读者与其说是“百读不厌”,不如说是“百说不厌”。经典固然好,后世的解说更重要。这也说明,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打开文本,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挖掘出来,引发新的问题。而中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经典有些不同,文本是不断地处在创编中,是活着的经典,充满生命力。因此,确定民族文学经典的标准、研究方法等,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第三个难点。

第四,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难。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风情迥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的共同目标。现在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从事着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些史料的语言、思维、结构等多有不同,却又都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引领下逐渐走向融合。如何处理这些史料,如何认识这些史料的价值,确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近年潜心于十六国北魏至隋代文学的研究,发现一个共性,即这个时期的不同民族,虽然纷争激烈,但多祖述共同的祖先黄帝、尧舜和大禹,以使自己立于不败的正统地位。可见,不论史料多么纷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自古以来就已铸牢在各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文学研究工作者就是要在丰富的史料中寻求中华民族之魂。这是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孜孜以求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承前启后,这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第四个难点。

第五,民族文学史料整合难。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古典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有着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研究成果汇为一编,融为一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族文学研究所曾共同编撰过一部《中华文学通史》,试图打通古今文学、打通不同文体、打通不同民族,设想很好,也作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文学史写作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各说各话,融通不足。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学术著作,总是摆脱不了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的束缚,让读者敬而远之。我们能否在文学研究中找到一种更好的叙述方式,让我们的研究著作,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特性,这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第五个难点。

因有上述五难,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就具有挑战性,吸引我们去探索,去研究。众所周知,史料的收集与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传统的方法。如何让传统的研究方法展现时代特色,却是一个新问题。我认为,这种时代特色主要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传承,二是学以致用。关于学术传承的时代特色,我在四川西昌召开的民族文学史料研讨会上的致辞中,从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并作为序言发表在《中华文学史料》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上。所谓“学以致用”,就是强调中华文学史料研究应当与时俱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作出贡献。两千多年前,《公羊传》就说过“中国不绝若线”这样的话,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这种思想如何在历代文学作品里体现出来,又如何融化在中华各民族的血液中,这是值得我们长久深思并亟待解答的论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接地气的学问,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不仅要展现深厚的人文情怀,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确实有很多难点,同时也充满魅力。可以说,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华文学史料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最有生机、最有发展、最有前途。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系作者在“中华文学史料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2021年年会暨第五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为止已播出10年,深受广大中国小朋友的喜爱。为响应文化“走出去”的号召,2020年该系列动画被翻译成英文等多国语言,在海外传播并得到好评。

《精灵梦叶罗丽》展现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动画人物服饰、场景设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该片以中华优秀传统中华文化为根,表达了当今世界共同认可的“爱与环保”理念。

(刘战英)

编者按:近日,“道家的生命智慧”高端论坛在河南省鹿邑县老子学院(研究院)举行。国内外近百名老学、道学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代表齐聚老子故里,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围绕“老子的智慧之思”“《老子》文献解读”“诠释视野下的《老子》”“庄子的生命智慧”“黄老道家的生命哲学”“多元视角下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等议题分别展开讨论,交流对道家思想哲学内涵与生活智慧的思想,探索老子文化与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版刊发老子学研究会会长王中江的主题文章,以飨读者。

道家的智慧是一个广泛的论题,它涵盖道家的整个哲学和思想,理解、掌握和运用这种智慧十分不易。老子洞察到“为学”和“为道”是人类事务中性质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求学是不断增加的过程,你越是认知具体的对象和事物,你知道的东西就越多;而你越是沉思超出具体事物之上的普遍的道理,你获得的东西就越少。

老子对“学”与“道”的区分,用现在的词汇来表达是知识与智慧的不同。有不同的知识,也有不同的智慧,它们对人的完整生活都是重要的。实用主义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对智慧敬而远之,在他们的心里和眼里,只有能够满足当下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那些东西,才是重要的。但稍微注意你就会发现,内化到中国人内心、精神、理性和伦理意识中的“道德”“道理”这两个概念显然属于智慧。道理是一个是非、对错的真假概念,道德是一个好坏、善恶的伦理概念。亚里士多德区分不同的智慧,有理性的智慧、伦理的智慧、实践的智慧。中国人的道理和道德概念,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智慧”和“伦理智慧”,但它们也有差别。儒家、道家的道德和道理概念整体上是统一的,真实对他们来说同时又是善,善也是真。这就是为什么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特征是“合真善”“同真善”。

道家的生命智慧作为道家整体智慧的一部分,它由一系列的论域构成:

家训 品鉴 ①

《弟子规》：蒙学经典

王杰

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早上应该早起,晚上不应该过早睡;因为人生易老,所以应该珍惜时光。

第五章《信》讲的是为人之道。“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开口说话,诚信为先;欺骗和胡言乱语,怎么可以拿来做人呢。

第六章《泛爱众》讲的是处世之道。“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凡是人类,皆须相亲相爱;因为同顶一片天,同住大地上。

第七章《亲仁》讲的是择师之道。“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同样是人,善善恶恶,心智高低,良莠不齐;流于世俗的人众多,仁义博爱的人稀少。如果有一位仁德的人出现,大家自然敬畏他;他直言不讳,不会察言色献媚。选择这样的人去亲近,才能提升自身的德行。

第八章《余力学文》讲的是学习之道。“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不能身体力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纵有知识,也只是增长自己华而不实的习气,变成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但是仅仅身体力行,不肯读书学习,就容易依着自己的偏见做事,也会看不到真理。

这样一部全文1080字、朗朗上口的《弟子规》流传了300多年,列举了为人子弟在家、外出、求学和待人接物应有的礼仪和规范,曾经是童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分、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传统读物。当今社会,学习并践行《弟子规》,仍然具有强大的时代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敦厚的心性品行;同时,它对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风气的净化,也大有裨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弟子规》提高了家家家教的地位。一个人要从小懂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学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懂得与仁爱之人打交道,并引以为榜样,然后还要重视身体力行去弘扬美

人情论的基础。道家相信道为万物赋予了不同的特性和根据,称为万物之德,是类似于万物之性的概念。它表现在人的身上就是人的德性和性情。道家的德性论认为,事物从道那里获得了各自的特性,叫作德。人也如此。人的美好特质,在老子那里叫赤子之心,在庄子那里叫“天真”,这是人应该保持和发展的美德;道家的人情论认为,人先天具有趋利避害、好生恶死的自然倾向,这是治道和制度的基础。

第四,道家的生命智慧十分崇尚人的生命和价值。老子、杨朱、詹何、公子牟、宋荣子、子华等都是生命主义哲学家,他们有一些信奉生命价值的标志性符号:贵生、重生、尊生、全生、保生、尽年、自爱、重己、贵己、为我等等。这些符号召唤人们捍卫人类生命的价值。道家的长生久视、不死的信仰,让我们热爱生命,拥抱生命的美好,追求生命的永恒。理性告诉我们,生命不能永恒,死亡不可避免。但道家的生命智慧能够唤起当代中国年轻人生活的力量和冲动。

第五,道家的生命智慧追求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无限性,追求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老子的心灵观追求人与道的合一,通过这种结合,人超凡脱俗。庄子的心灵观追求人的逍遥和精神境界,追求神游宇宙,追求人的自我转化。

第六,道家的生命智慧提供了养生的重要理性原则。《庄子·刻意》篇提到了“导引”的概念;《庄子·外物》篇提出了具体的保健方法,说安静可以治愈人的疾病,眼部按摩可以使人变得年轻,安宁可以控制人的急躁(“静默可以补病,眇眇可以休老,宁可以止速”)。但庄子真正注重的是过一种合理的生活,过一种由理性和高级原则引导的生活。庄子在《养生主》中教诲说,一个人只要遵循了不好名、不过度和中道的理性原则(“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他就可以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全自己的生命,保持心灵的愉悦(“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道家的生命智慧既朴实,又高明;既丰富,又深刻;既古老,又常新。不断体悟、体认道家的生命智慧,不断创新发展,就是生命的不断创造。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老子学研究会会长】

德,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的素养,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今天的孩子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孝、弟(悌)、谨、信、亲仁这些美德的学习,人们不能仅仅关注孩子物质生活、升学知识和就业知识的学习,却降低甚至忽视了其他方面特别是品行操守方面的要求,这样的教育最终是失败的。

二、《弟子规》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稳定、人民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大潮面前,也出现了利益至上、诚信缺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风、政风、党风。学习《弟子规》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提供不竭的动力。

三、《弟子规》反映了公民道德的内涵。《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落实“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举措。公民道德建设的落脚点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弟子规》中,“长者先,幼者后”“己有能,勿自私”的要求,反映了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的社会公德;“凡出言,信为先”“凡是人,皆需爱”等内容,反映了诚实守信、服务人民等职业道德的要求;“入则孝、出则悌”“衣贵洁、不贵华”等反映的是尊敬长辈、勤俭持家等家庭美德的要求。可以说,《弟子规》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提倡的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可谓一致百德、殊途同归。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